

左手回龙窝,右手快哉亭

卷风

在古老的徐州城里,有两处别样的风景,左手边是回龙窝,右手边是快哉亭。它们如同两颗璀璨的明珠,镶嵌在城市的脉络之中,静静诉说着岁月的故事。

回龙窝,一个名字富有诗意的地方。踏入其中,仿佛穿越了时光隧道,回到了久远的年代。

乾隆皇帝六下江南、四驻徐州,相传他在城南私访民间,无奈返回时找不到来时的路,来回徘徊逗留,故名回龙窝。青石板路在脚下蜿蜒伸展,每一块石板都被岁月打磨得光滑圆润,记录着无数行人的足迹。路两旁是古朴的民居,青砖黛瓦,飞檐斗拱,散发着浓厚的历史气息。那些错落有致的房屋,像是一本本厚

重的史书,每一页都写满了往昔的繁华与沧桑。

漫步回龙窝,阳光透过斑驳的树叶缝隙洒下,形成一片片光影交错的图案。街边的传统手工艺品店里,匠人们正专注地雕琢着手中的物件,那神情仿佛时间都为它们而静止。古色古香的茶馆里茶香四溢,人们围坐在一起,一边品茶,一边聊着家长里短,悠闲的模样让人心生羡慕。在这里,时间仿佛放慢了脚步,让人有足够的闲暇去感受生活的美好,去品味岁月的沉淀。

快哉亭,则像是一位豪迈的诗人,屹立在城市的一角,散发着豁达与不羁的气息。快哉亭始建于北宋,历经千年风雨洗礼,依然风采依旧。亭前远

眺,远处的山峦连绵起伏,与蓝天白云相映成趣。亭内,匾额上“快哉亭”三个大字苍劲有力,仿佛在诉说着当年苏轼在此留下的千古佳话。

遥想当年,苏轼被贬于此,却并未因此而消沉。他在快哉亭上,挥笔写下了“一点浩然气,千里快哉风”的千古名句,那豁达的心境和豪迈的气概,让后人敬仰不已。如今,当我们登上快哉亭,迎着那扑面而来的风,仿佛能感受到苏轼当年的豪情壮志。那风,像是一种精神的传承,激励着我们在面对生活的挫折时,要保持乐观豁达的心态,勇往直前。

左手回龙窝,右手快哉亭,它们代表着这座城市不同的两面。回龙窝是城市的根,是传统文化的守护

者,它承载着人们对过去的回忆和对传统生活方式的眷恋;快哉亭则是城市的魂,是一种精神的象征,它鼓励着人们在困境中保持乐观,勇敢地追求自由和理想。

当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感到疲惫时,可以走进回龙窝,去感受那份宁静与安详,让心灵得到片刻的休憩;当我们在面对困难和挫折时,可以登上快哉亭,去汲取那份豁达与豪迈的精神力量,重新鼓起勇气,迎接生活的挑战。

左手回龙窝,右手快哉亭,它们相互辉映、相得益彰,共同构成了这座城市独特的风景线。它们是历史的见证者,也是文化的传承者,更是我们心灵的寄托之所。

根雕

刘念强

多年前,这种景象随处可见:平原的村庄被各种各样的树环抱着,树与村庄俨然混为一体,分不清谁是筋肉谁是骨骼——树生长着,村庄壮大着,相互间似乎有着默契。

彼时,我们村无论从哪个角度看,都掩映在树丛中。即使冬天树叶落尽,那些密匝匝的高低枝干,也会把它遮挡得很严实。说真的,树在乡村生活中,在童年时光里,以至于某一天对村庄回望之时,永远不可能绕开。怎么能绕开呢?家就在某棵树旁,在它的浓荫下。

这些树木,我对槐树印象更深,也更难忘。槐树分为国槐和洋槐两种,前者是土著,后者属外来移民,但现在都本土化了,统称槐树。国槐是土生土长的树,相比其它植物成材较慢。它往往枝繁叶茂,树冠特别有型,密不透风,树干笔直上挺,很少生斜枝。看上去国槐像树中君子,显出一副儒者风度。洋槐又叫刺槐,原产北美,再传欧洲,100多年前引入中国。洋槐长得快、成材早,它洁白的、花团锦簇的洋槐花,宛如众多成熟的谷穗在枝叶间低垂,人们采下清香浓郁的花串,饥饿时可果腹。

小时候的夏日夜晚,我们洗完澡,三五好友相约,每人头顶一张用芦苇编成的凉席,来到村外大堰上。所谓大堰,是因为这里有一条水渠,渠两边的堤上都是洋槐树,多有碗口粗。大家选一块平坦的地方,各自抢占“一席之地”,这其中少不了争吵,但只会有一小阵的嚷嚷,之后就平息下来,因为有人发话“开始讲故事了”。讲故事是轮流来的,一般都是鬼怪故事,红眼睛、绿鼻子、四个大毛蹄子之类的,讲的人故意吓唬人,听的人小声喃喃咕咕,眼睛向四周溜一圈。当然,什么都没有,除了不远处的稻田里青蛙在叫。“好了,睡觉。”有人大喊一声,大家就在槐树下、在凉爽的风里进入梦乡了。

槐树木质坚硬,是做家具、农具的好材料。饭桌、板凳、柜子都有槐木的奉献,锄把、锨柄也大多使用槐木,因为它有硬性的一面,也有柔韧不折的一面,尽管铁锨、锄头的把柄都被磨得光滑发亮,依然结实耐用。板车、犁耙变得黑乎乎了,好像要散架朽掉了,可坚实的槐木初心不老,它仍旧不弃农田。非常庆幸,槐木和其它树木并肩,既撑起了农家生活,又支撑那个时代走过了艰难的行程。

我离开老家后,靠近大门一侧的院墙外,某天突然长出一棵槐树苗,原来院内曾砍伐过一棵槐树,它的根钻过院墙,到春天发了新芽。我十分惊喜,叮嘱左邻右舍好好看护。此后每次回家我都要看一阵,看它一年比一年高。三年后,它竟被一股风刮断,从此再不见它的挺拔。我不由地莫名难受,如同失去了一个朋友,失去了一个替我守护家园的人。

此后的生涯里,我辗转各地居无定所,槐花始终香在梦中。但在老家,槐树日渐稀少,先是被银杏取代,接着又被更速成的意杨换下,要见槐花,村庄里难遇,只好去荒山野岭了。

然而,槐树不应该被忽略。它给过世界的,世界也该给予它。作为一个物种,它的寿命不过百年,但天南地北仍不乏几百年甚至千年以上的古槐存世。它们活成了一种符号,一种精神,甚或一种象征。

去看看山西洪洞那棵老槐树。六百年来,它老而不朽、枯而不凋,红带飘飘,既是祈愿又当祭祖。明初百万移民从大槐树出发,历经数百年,其后裔已达两亿多人,而大槐树就是他们共同的根。大槐树的根,历史老人把它雕成了祖先。

我们村的那些槐树,虽然不高大、不古老,甚至还生着尖刺,但埋在黄土下的根,一样坚实、柔韧,在岁月的烛光下,我已屏住泪把它雕成了故乡。

童年的年味

孙培棠

过了腊八就是年!街上渐渐挂起了灯笼,贴起了福字。可不知怎么,我心里却找不回以往过年的兴奋劲儿,反倒是小时候的年味,像一坛封存的老酒,时间越长,味道越醇,总在不经意间飘进心里。

1968年的春节仿佛就在昨天。刚进腊月,生产队就把一年的收成分到各家,小麦、玉米、黄豆、高粱……粮袋堆进屋,过年的序幕就算拉开了。紧接着,村里的四盘石磨开始日夜不停地转。那时候村里没电,磨面全靠人力。一家老小围着磨盘,一圈一圈推下来,腿酸胳膊疼,头晕眼花。可一想到晚上能喝到热腾腾的秫豆面条,浑身就有劲儿——要知道,平时顿顿吃白芋,胃里直冒酸水,喝一碗面条,简直就像提前尝到了年的甜头。

腊月二十过后,外出扒河的劳力们回来了,生产队开始组织擢水逮鱼。两个两三亩大的汪塘,十来个汉子用水桶昼夜不停地擢。两天一夜,水干了,鱼现了。全村人都围在岸边看,一见大鱼翻腾,就齐声惊呼。所有鱼过秤后分到每家每户,大人小孩都笑得合不拢嘴。这还不算完,大家卷起裤腿,冲进塘底“捡漏”。我们这群半大孩子冲在最前面,冻得脚趾通红,浑身是泥,哪怕只摸到几条小鱼,也高兴得像捡了宝。那时的快乐,真简单。

腊月廿八,是村里最热闹的一天——杀猪。一年到头难得见荤腥,大家都盼着这一天。天还没亮,猪的嚎叫声就把全村人唤醒了。烧水的锅热气腾腾,柴火噼啪作响,火苗映着一张张期待的脸。杀猪匠手脚麻利,放血、吹气、烫毛、开膛……不一会儿,肥猪就变成了案板上的肉。村里杀四头猪,按人头每人分到2斤1两半。抓阄按号领肉,公平又省事。大家提着肉往家走,脸上都是笑,一年的辛苦仿佛都被这块肉驱散了。

腊月廿九是娘和婶子们忙活的日子。剁馅声“当当当……”响遍全村,

在我听来,那是最动听的年曲。炸丸子的香气飘满巷子,可我顾不上闻——我被拉去写春联了。全村就我勉强算个“文化人”,字写得跟鸡挠的似的,可来找我写春联的人从早到晚不断。红纸铺开,墨汁味儿混着年味儿,心里莫名地有庄严感。

年三十中午,鞭炮声此起彼伏,红春联贴上门楣,像给村子换上了新衣裳。我家饺子下锅时,鞭炮也响了。我们兄妹三个和父亲端起碗狼吞虎咽,第一锅饺子还没吃完,第二锅就熟了。直到锅里只剩下三个饺子,我才注意到娘一直没上桌。她笑着说:“你们先吃,不够我再煮。”等我们吃完,却看见娘在灶边啃着白芋面团子,喝着一碗饺子汤。我问她怎么不吃饺子,她淡淡地说:“干活累了,不想弄,下回再吃。”很多年后,每当想起那个画面,想起娘低头啃面团的样子,我都忍不住鼻子发酸,在心里喊:“娘,你还没吃饺子呢……”

年初二的午饭,是唯一正经吃肉的一顿饭。肉早早就勾得人坐不住,娘把肉炖好分成五碗,我们碗里堆得满满当当,唯独她那碗只有薄薄一片肉。这回谁也没动筷子,父亲瞪着眼:“饺子你没吃,吃肉你又不盛,让我们咋吃?”娘夹起那片肉笑了笑:“这不是肉吗?”我们没说话,默默往她碗里夹肉。娘却急了,一边往回拨一边说:“我不爱吃肉,尝两片就够了……”话没说完,眼里已闪着泪光。

这就是我娘。如今她已在遥远的地方,不知道那里有没有饺子,有没有肉香?娘,儿子真想您啊……

童年的年味,是盼吃的嘴,是疯玩的劲,是听说书、听大鼓、看宣传队演出的热闹,是简单却饱满的欢喜。如今,平时的生活就像过年,可那份纯粹的期盼和热闹,却淡了。岁月往前走,年味慢慢留在了身后,唯独那些关于年的记忆,关于娘的记忆,一直暖在心头,陪着我走过一个又一个冬天。